

祝尚书 著

北宋古文运动 发展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祝尚书 著

北宋古文运动 发展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祝尚书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
(博雅文学论丛)

ISBN 978 - 7 - 301 - 19995 - 4

I. ①北… II. ①祝… III. ①古文运动 - 文学史 - 中国 - 北宋
IV. ①I209.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7640 号

书 名: 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

著作责任者: 祝尚书 著

责任编辑: 徐丹丽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9995 - 4/I · 243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pkuphilo@163.com

印刷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19.75 印张 284 千字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引论：北宋古文运动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	(1)
--------------------------	-----

第一章 宋初古文：由方兴到失败(上)

——柳开与宋初古文运动	(10)
-------------------	------

第一节 柳开与宋初“道统派”古文家	(11)
-------------------------	------

第二节 柳开对古文理论的贡献	(17)
----------------------	------

第三节 柳开“文道一元论”的谬误	(22)
------------------------	------

第四节 “道统派”古文家的古文创作	(37)
-------------------------	------

第二章 宋初古文：由方兴到失败(下)

——王禹偁与宋初古文运动	(47)
--------------------	------

第一节 王禹偁与王禹偁派古文家	(47)
-----------------------	------

第二节 王禹偁派古文家的理论贡献	(54)
------------------------	------

第三节 王禹偁的“易道易晓”说	(63)
-----------------------	------

第四节 王禹偁的古文创作成就	(67)
----------------------	------

第五节 宋初“好古”的骈文家	(70)
----------------------	------

第六节 宋初古文运动的失败	(82)
---------------------	------

第三章 北宋前期：古文运动在低潮中坚持

第一节 穆修的固守坚持与力行	(88)
----------------------	------

第二节 “门满道不绝”：尹洙与苏舜钦	(96)
--------------------------	------

第三节 姚铉《唐文粹》	(103)
-------------------	-------

第四节 石介与泰山派古文家的崛起	(104)
------------------------	-------

第五节 石介与古文运动的新危机	(110)
-----------------------	-------

第四章 北宋中期:古文运动走向胜利	(126)
第一节 欧阳修及其文、道观	(126)
第二节 欧阳修的古文理论	(137)
第三节 欧阳修与西昆体、太学体的斗争	(146)
第四节 欧阳修的古文创作成就(上)	(156)
第五节 欧阳修的古文创作成就(下)	(164)
第六节 欧阳修的古文队伍建设	(175)
第七节 范仲淹与韩琦	(179)
第八节 欧门古文家论略 ——苏洵、王安石、曾巩	(182)
第五章 北宋后期:古文运动最终完成	(200)
第一节 苏轼及其古文理论	(200)
第二节 苏轼的古文创作成就	(209)
第三节 苏辙的古文主张与创作成就	(219)
第四节 苏门古文家论略 ——前后“四学士”、“六君子”	(226)
第五节 北宋古文运动胜利完成	(244)
第六章 北宋古文运动与佛教	(246)
第一节 北宋排佛的古文家	(247)
第二节 西湖白莲社与官僚文士的交流	(252)
第三节 释智圆的“三教合一”古文论	(256)
第四节 释契嵩的“辅教”与“非韩”	(264)
第五节 古文家居士化及其文学史意义	(270)
第七章 北宋古文运动与道学	(282)
第一节 宋初古文家的道学倾向	(283)
第二节 道学崛起及道学家的文学观	(285)
第三节 古文家的“道德性命论”	(291)
第四节 古文家与道学由斗争到融会	(299)
初版本后记	(307)
增订本后记	(310)

引论：北宋古文运动发展的社会 文化背景

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唐宋古文运动是影响深远、富有光彩的一章。它是在思想文化发展历史上的一些特定拐点，由一批具有文学革新精神的作家自觉发起，并坚韧不拔，前赴后继，先后经历了近三个世纪的艰苦努力和斗争，最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登上了我国古代散文创作的最高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文学理论，为后人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文学遗产。如果没有他们的不懈奋斗，那么我国的古代文章，自六朝以降，很可能只是一部抽黄对白的俳谐文学史，那该是何等的寂寞和荒芜！

中唐古文运动的发起者和杰出领导者是韩愈（768—824）。他提出了著名的“道统论”和“文统论”，但以“文统”为主，辞章之学是他的偏爱。在柳宗元（773—819）的配合下，无论在理论建树和创作上，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他们的功绩是永垂文学史册的。

中唐古文运动由于各种原因，后来失败了，但并没有被消灭，它播下的种子仍在压迫下萌发滋长，终于在新王朝北宋兴起了先后由欧阳修、苏轼领导的古文运动。中唐古文运动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光辉榜样，是思想和力量的源泉，它极大地推动了北宋古文运动；而北宋古文运动，又是对中唐古文运动的天然继承和改进、发展。唐宋古文运动，从时代而言，它们是不同的两个时期；但就文学自身的发展逻辑而论，又是一线贯穿的有机整体。中唐古文运动是发轫、拓荒，而北宋古文运动才是完成、结果。韩、柳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光辉旗手，而欧、苏则是北宋古文运动的杰出领袖。韩、柳、欧、苏，成为唐宋古文运动直插云霄的四座高峰，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大文豪。

北宋古文运动,是在北宋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中产生和发展的。它既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又受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渗透和制约。社会文化不仅决定了古文运动的内容、面貌,同时还决定了它的发展进程。严格地说,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不过是北宋社会文化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北宋文学发展史的一个分支。因此,本书在讨论和研究北宋古文运动之前,有必要先简要地叙述一下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

北宋古文运动的社会文化背景十分复杂,就对古文运动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因素而言,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重文抑武的统治政策

宋初太祖、太宗两朝约四十年,是新兴统治集团由以武开基到以文致治的转变时期。太祖建国后不久,便认识到文治的重要性,于是广收图籍,劝武将读书,用儒臣为相,掌军、知州逐渐改用读书人。同时又开科取士,尊崇儒家先师孔子,力图造成尚学重文的社会风气。太宗继续推行文治路线,扩大进士及诸科的录取规模,召集儒臣编书,礼敬文士,封孔子后裔,等等。于是,重文抑武、精英治国成为制度,正如蔡襄所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①这一系列重文的措施,造成了官僚的文人化,同时也造就了有宋一代文化学术的高度繁荣。《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序》曰:“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重文的社会政治环境,必然重视培养文士阶层作为官吏后备队伍。上述各种措施中,教育和科举最为重要,因为“文人”是由教育培养出来的,又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科举的繁荣刺激了私学和书院的发达,仁

① 《国论要目》,《端明集》卷二二。

宗庆历间又下诏办学,从此公立学校教育逐渐兴起。隋、唐以来形成并确立的科举制度,经真、仁两朝的不断改进,已基本完善和成熟,特别是糊名、誊录制度的实施,“以文章取士”的“至公”原则的确立,“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①为人才流动、尤其是为中下层知识分子提供了进身的机会。宋真宗曾作《劝学诗》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②这是用荣华富贵引诱人们读书。露骨的名利追逐固然有毒化社会风气的一面,正如张方平所说:“凡诸为士之民,惟以为干禄之路。……是以天下学士靡然向风,非惟道化所陶,抑由宠利所诱也。”^③但同时也造就了全社会持久的“读书热”,又如苏辙所说:“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④宽阔的读书仕进之路,学子们莫不跃跃欲试;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丽神话,更搅动着他们的心田,即便皓首穷经而不悔,有的甚至为之痴狂。

重文的政策还为文人创造了优越的社会环境和优裕的生活条件。据说宋太祖曾立“誓碑”,诫约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⑤因此政治气氛比较宽松,文士坐事,最严厉的处罚不过是贬官或流放,极少有人被杀。由于私学及民间书院的发达,不同学派之间可以争鸣,思想比较自由,即使“疑经”也无不可。在经济上,虽然国家贫弱,文士的待遇却相对优厚。学校生员有食钱。入仕后俸禄名目繁多,有官俸,禄粟,职钱,公用钱,职田,春、秋衣服,米面,酒肉及炭薪补贴,等等。即使不任职,还可按原有的品秩主管宫观以支取干薪。官户则有免税、免役等优待。故宋人深有感触地说:“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⑥文士享用的固然

① 陈傅良《答林宗简》,《止斋文集》卷三五。

② 《详说古文真宝大全·前集》卷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校点本。

③ 《乌尧论·选举论》,《乐全集》卷八。

④ 《上皇帝书》,《栾城集》卷二一。

⑤ 陆游《避暑漫钞》引《秘史》。

⑥ 《燕翼诒谋录》卷五。

是百姓的血汗,但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使他们可以免除后顾之忧,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潜心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化艺术活动。

统治集团的重文政策,目的自然是造就有文化的接班人以巩固封建制度,但客观上又培养了庞大的文人队伍,孕育出群星璀璨的作家群体,搭起了施展文学才华的宽广平台。宋代包括古文家在内的作家们,虽有不参加科举考试的,但很少,绝大多数都有“出身”,有官职,兼具官僚和文人二重身份,因此积极参与政治,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事业心。在重文的社会大环境中,他们争相奋起,勇于承担,力求以诗文名扬当代,为新兴的王朝效力,而同时又以“追还唐风”、振兴有宋文章为己任。宋初古文由此发端,北宋古文运动也由此而取得最终胜利。

二、政治改革和文学革新的不断开展

宋太祖赵匡胤靠发动兵变而黄袍加身,代周自立,建立起宋王朝。他鉴于五代之乱和自己行为的不光彩,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重演,于是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加强中央集权,如夺武将兵权,^①集中政治权和财权,提高谏官地位以加强监督权,等等。正如太宗在即位赦天下的诏书中所说:“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②所有这些统治政策和政治制度,构成了所谓“祖宗家法”,其积极方面是保持了社会的稳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到仁宗时,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经济繁荣。这是整个观念形态的文化(包括文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然而谨守“家法”,久则生弊,制度变得僵硬,社会缺乏生气。也是到仁宗时,冗兵、冗官、冗费现象已十分严重,国家处于“积贫积弱”的危机之中,有识之士纷纷上书,要求改革朝政,于是出现了“庆历新政”,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提出十大新政,^③核心是整顿吏治,惩治腐败。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及大官僚的既得利益,很快就失败了。

① 建隆二年(961)七月,太祖采纳赵普的建议,有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之举,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

③ 具体内容详见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

然而变革的思潮并没有消失,更大的改革风暴正在酝酿,终于在神宗熙宁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运动,这是人们所熟悉的。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许多政治改革家同时又是诗文革新家。这个现象不难理解,因为衰败的社会风气必然产生衰敝的文风,它们本身都是政治改革家们试图革除的社会弊端。如欧阳修,他既是推动“庆历新政”的重要人物,同时又是文坛盟主,一直领导古文运动走向胜利。即如古文运动后期的领袖苏轼,他虽反对王安石变法,反对的只是王安石的激进措施,他本人也是积极主张变革的。革新文风固然不同于革新政治,欧、苏等在政治改革的理想遭到挫折之后,更倾其心力进行文风改革,这也是认识北宋古文运动时应当注意的。

三、“三教合一”的文化政策与道学的勃兴

佛、道二教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安史之乱”后,许多文人士大夫从文化层面进行反思,将社会的丧乱归咎于佛、道泛滥和儒教的衰落。中唐古文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纯洁和振兴儒教,打击佛、道势力,以减轻农民负担,巩固和加强刚从“安史之乱”的惊涛骇浪中稳定下来、然而已一蹶不振的唐帝国的统治。这时,韩愈在所作著名论文《原道》篇中提出“道统论”。“道统论”的核心是建构起儒教传承宗统,以对抗佛、道二教。后经武宗灭佛,但并不成功,唐末五代时期佛教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究其原因,是佛教已深深扎根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成为统治阶级不可缺少的统治工具,同时也拥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特别是禅宗,成了许多文人士大夫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看来简单地“灭佛”是不管用的,柳宗元早就主张沟通儒佛,以佛济儒。

宋兴,最高统治者虽确定了以儒治国的方针,却又对佛、道采取扶持的态度。太祖曾令修废寺,禁毁佛像,雕造藏经。太宗建译院,大量校刊佛典。端拱二年(989),田锡作《大宋重修铸镇州龙兴寺大悲像并阁碑铭》曰:“我国家……革有周之正朔,造皇宋之基业,南取越,西平蜀,崇道

兴佛法,无文咸秩,隳像重兴。”^①到真宗时,统治者在重视儒教的同时,正式提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主张,并以此作为王朝的文化政策。真宗仍然重视儒教,曾对陈彭年说:“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太祖、太宗丕变弊俗,崇尚斯文。朕获绍先业,谨遵圣训,礼乐交举,儒术化成,实二后垂裕之所致也。”^②但他同时又对宰相说:“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大抵皆劝人为善,唯达识者能总贯之,滞情偏执,触目分别,于道益远。”^③真宗尝作《崇释论》二篇,略曰:“奉乃十力,辅兹五常,上法之以爱民,下遵之而迁善,诚可以庇黎庶而登仁寿也。”又曰:“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而道同,大指劝人之善,禁人之恶。不杀则仁矣,不盗则廉矣。”^④真宗笃信道教,曾下诏编道藏,亲自导演了所谓“天书”下降的闹剧,并建玉清昭应宫供奉之,又下诏在全国范围内修建宫观。真宗以后的各代皇帝,虽信奉或有偏好,大致情况也差不多,儒教是他们必不可少的“门面”,骨子里却不同程度地奉佛崇道,而北宋亡国之君徽宗,更是个不折不扣的道教徒。

宋初的部分古文家仍坚持整顿和纯洁文化的主张,上继韩愈“道统论”,如柳开、石介等,皆以“卫道”而坚决排佛老。王禹偁等人则虑及国计民生而排佛。但“三教合一”是文化发展的方向,也是统治集团的大政策,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历史最终像开了个玩笑:到北宋中后期,古文家不仅摈弃了“道统论”,许多人还成了佛门“居士”,有的甚至打出“护法”的旗号;而不少诗文僧则成了古文家的座上宾,他们平等对话,往复酬唱甚欢。在这点上,唐、宋古文运动所面临的文化背景很不相同,值得分外关注。

更值得注意的是,“三教融合”的结果,使传统的儒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促成了“道学”的诞生与勃兴。^⑤道学肇端于韩愈、李翱。韩愈在

① 《金石萃编》卷一二五。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九。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一。

④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七二。

⑤ 道学,又称理学。学术界认为理学包括道学和心学,范围要大一些。本书于北宋一般称道学,南宋以后称理学。

《原道》篇中提出从周公到孔子圣贤相传的“道统”。李翱吸收佛老思想，推崇“寂然不动”的境界，比韩愈更关注人的精神修养问题。他们的思想和所提出的哲学范畴，成为后代学者建构道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北宋中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等正式创立了道学。道学将“道统”与道德性命观念紧密结合起来，大量吸收佛、道二教的精华，却又以正统儒学自诩，将自己的学说与先秦儒家“圣贤”直接挂钩，故现代学者称之为“新儒学”。中经王安石“新学”及苏轼“蜀学”的打压，到南宋朱熹集其大成。道学对儒家经典重新加以阐释并进行哲学论证，将作为伦理之学的儒学哲学化，使之在理论上能与佛、道相抗衡；同时又将佛、道出世的修养方式引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向，使哲学的终极目标由彼岸回到此岸，适应了重建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的政治需要。本书虽不研究佛、道二教，也不研究道学，但欲考察古文运动，它们却又都是迈不过的坎。尤其是道学，尽管它在北宋时期势力还较小，但其文学观的影响却很大；到南宋中后期，道学逐渐登上殿堂，并最终成为官学，而古文则在相当程度上成了理学家“载道”的工具，“语录体”泛滥，文学性的古文创作衰落，古文家们只能探索“辞章之文”与“理学之文”相“融会”的发展道路。

四、印刷术的普及使文籍广为流通

唐末五代以后，印刷术由发明走向普及，使文籍广泛流通成为可能，一千多年来的优秀文学遗产得到充分利用。尤其是积淀丰厚、成就辉煌的唐代文学，更是宋代文人们取之不竭的宝藏。这大大推动了文学事业的发展。有宋一代刊印了大量书籍，无论是经史子集，还是前人或本朝人的作品，或官刻或坊刻或家刻，书籍之富，宋人曾以“山积”来形容，私家收藏动辄万卷。比如韩愈集，宋初柳开整理过，穆修刊印过，今知传世的有蜀本、大中祥符杭州明教寺本、宜春新旧本、饶本、嘉祐杭州本等等，这对人们学习韩文、推动古文运动，无疑十分有利。当时著名作家的作品，也很快被传刻摹印，如欧阳修、苏轼的诗文，生前就已有多种刻本。图书的广泛流布，既提高了全民的文化素质，也使文学观念及作品迅速传播，

加快了文风变革和文学发展的步伐,这是唐以前靠手工抄写所无法比拟的。

上述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单就文学或古文运动而论,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重文的统治政策和科举的繁荣,更加剧了官府对文风的“指挥棒”作用——为追逐功名利禄,有司以骈文取则世习骈文,以怪僻取则士子怪僻成风。书籍的广为刻布,使各种文学流派迅速崛起,这也增加了古文运动的复杂性和文体改革的难度。如杨亿等人的《西昆酬唱集》出,“西昆体”成为时尚,散文跟着“四六”化,一时古文处于下风。进士高等的试卷被迅速传刻,士子们争相模仿,又很容易刮起各种各样的“风”。人们对多种文体和风格进行选择 and 比较,增强了鉴别力,当然很有好处;不过流行的未必是好的,选择需要时间,客观上又决定了古文运动的长期性和曲折性。

总之,北宋古文运动基本上是在有利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开展的。但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它仍然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路,前后经历了约一个半世纪之久。根据北宋古文运动自身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不同特点,同时为了叙述方便,本书相对地将它分为宋初、北宋前期、北宋中期、北宋后期四个阶段。这样分期也许并不十分确切,但大体可以看出整个运动的发展轮廓和轨迹。宋初的特点是由方兴到失败。北宋前期则是在低潮中相持,然后出现了一个很不健康的小热潮。北宋中、后两期,是由胜利到完成。每个阶段之间又是紧密联系的,前一阶段的不足或失误,成为后一时期的教训和改革的任务。尤其是各时期所取得的大小不同的进步和成就,不仅为古文运动的继续开展积聚着力量,也为最后胜利完成创造着条件。北宋古文运动中由“排佛”到“三教合一”的转变,道学的兴起及其对古文运动的影响,无论是对运动的进程还是对古文创作,都产生过重要的甚至是特殊的影响,本书将分别用专章进行讨论。

应当特别指出:“中唐古文运动”是个宽泛的概念,它不仅是文学运动,同时也是思想文化运动。韩愈提出“道统”、“文统”二论后,又与柳宗元分别提出以文“明道”说,将“文”(辞章)与“道统”区别开来,故他们所推动的,实际上是以文体改革为核心的文学革新运动,即狭义的“古文运

动”。本书所研究的北宋古文运动，即是以文学革新为主要内容的古文运动。这里的所谓“文学”，是传统文学观下的文学，亦即杂文学，而不全是现代文艺学所说的文学，论述时不再说明。

本书写作中，适当详中小家而略大家、名家。比如宋初，文学史一般都很简略，学界也极少论及，本书以两章篇幅加以详述；而像欧阳修、苏轼两位古文运动的领袖和文学大师，以及其他一些古文大家、名家，学界相关的论著已十分丰富，这里只讨论他们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贡献及相关问题，当然也要举例论及他们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成就，但对更多作品的分析、研究，不是本书的任务。此外，北宋中后期有成就的古文家很多，本书也只限定在与古文运动发展直接有关的范围之内，并不全面论述——全面论述也许是诸如《宋代散文史》之类著作的任务。

文学史上的“古文运动”，如果从全过程说则包括唐、宋，称“唐宋古文运动”，如果单论宋代则称“北宋古文运动”——到北宋后期胜利结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此后的古文当然还要继续发展，在发展中也还会有各种风格流派的变迁、曲折甚至斗争，但已不属文体革新的范畴，或者说不再称为“古文运动”了。北宋古文运动的胜利完成，已大致决定了南宋以后历元、明、清数百年文章的总体面貌——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为止。

第一章 宋初古文：由方兴到失败（上）

——柳开与宋初古文运动

有宋太祖、太宗两朝约四十年，是为宋初。宋初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发轫阶段。

宋初与唐初有某些相似之处，如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文学低落，存在着扭转方向、纠正文弊的问题；一个基本统一的大王朝诞生了，如何使文学与新王朝的声威相适应，创作出文质并茂的新文学从而为之服务的问题，等等。不过宋初与唐初又有很大的不同。空前繁荣的唐代文学相去不远，尤其是中唐古文运动，对作家们来说不仅记忆犹新，而且经历了唐末五代战火的洗礼，古文仍不绝如缕，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因此，有宋建国不久，拈出古文运动以发展宋代文学、不使唐文专美于前的文化建设课题，便由作家们提上了议事日程。

宋初古文，经历了由初步兴起到失败的过程。柳开、王禹偁分别代表了古文阵线内部的两个不同派别，他们无论在理论主张还是创作实践上都有较大的不同。宋初古文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高扬“文学韩柳”的旗帜，但在“学韩”的方法上却出现了偏差：一些作家过分强调儒家“道统”，尤其是柳开，他力图将古文运动变成儒学运动，主张文、道合一，实际上是将古文纳入“道统”的范畴，使“文”成为“道”的附庸，具有明显的道学倾向。这就决定了宋初古文运动一开始便出现了方向性的歧误，虽有王禹偁等作家的补偏救弊，但仍难挽回失败的命运，也注定了北宋古文运动曲折发展的道路。

第一节 柳开与宋初“道统派”古文家

以柳开为代表的一派古文家，在宋初首先起来批判唐末五代的颓靡文风，提倡文学韩、柳，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柳开学韩不久，即以“宋之夫子”自居，转而“开道”，企图由古文达于“古道”，结果将古文运动引入了歧途。这派古文家的创作拙鄙苦涩，成就不大，最终使刚刚兴起的古文运动很快低落，文、道一元以兴起古文的尝试也归于失败。

南宋末作家赵孟坚在论述北宋古文运动的发展演变历程时写道：

皇朝文明代兴，庆历以前，六一公欧氏未变体之际，王黄州（禹偁）、范文正（仲淹）诸公充然富赡，宛乎盛唐之制，亦其天姿之复，已脱去五季琐俗之陋。一阳动于黄钟，厥维有本。伯长（穆修）一鸣，尹（洙）、欧（阳修）、仲涂（柳开）和之，南丰（曾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又和之，元祐诸君子又从而和之，轰然古雅，至淳（熙）、乾（道）尚余音韵。其风稜骨峭，摆落繁华，亦一代之体也。^①

以上讲到了整个北宋古文运动的发展演变过程，并列举了主要古文作家，他们之间的开创、继承关系，他们的功绩、成就及影响，可称简明扼要，这里先将它引出，可以留下一个总体印象。但是赵孟坚说柳开是“和”穆修，则显然弄错了时代：柳开开始倡导古文时，穆修还没有诞生。可见宋末人对宋初作家的世次已不甚了了；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影响有限，宋初作家中许多人更不为今人所知。因此，在论述这段古文运动的历史时，有必要首先简略地考述该时期主要的古文家及其生平事迹。这里大致按年代先后，将考察的重点放在他们相互师友承传的关系上，而根据这些关系，即可基本摸清宋初古文运动的脉络。

宋初部分作家以“古文”相号召，试图革新文体，繁荣创作，而这一行动之所以成为“运动”，首先是它形成了以柳开、王禹偁为代表，以围绕在

^① 《凌愚谷集序》，《彝斋文编》卷三。

他们周围的师友门生为基本力量的作家队伍。围绕在柳、王周围的作家，不一定每个人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都与柳、王相同，甚至他们中的某些人不一定有所宗主，但他们相互间又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或共同性，为了叙述方便，姑且将他们归为“一派”。宋初最早举起古文旗帜，以文学韩、柳相号召的是柳开。柳开等古文家在号召古文的同时，大倡儒家“道统”，也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并较容易地将他们与同时期以王禹偁为代表的古文群体相区别，姑称之为“道统派”。

柳开(947—1000)，字仲涂，大名(今河北大名东北)人。自称柳宗元是他的先祖，又称唐昭宗时丞相柳璨是其大王父。^①祖父柳彝卿，不仕。父承翰(903—965)，字继儒，五代后唐庄宗同光年(923—926)始任汤阴簿，长兴岁(930—933)为和顺令，秩满潜归，除临黄令，由魏州录事参军历临洛、南乐、冠氏三县令。宋太祖建隆初首得元城令。乾德元年(963)，承翰向丞相上书，“求一通籍，官终其老”，遂于次年拜监察御史。乾德三年，太祖召拜泗州通判，同年五月卒于任所。前后“考二十，绝有纤失，事十帝四十年”。他“年二十二学诗于隐者孟若水，从万俟生授字学，为文章”。^②由此可见，柳开出身在一个有较好文化素养、久历仕宦的低级官吏家庭。

柳开从小随父历徙任所。大约十七岁时，他开始学习韩愈文。《东郊野夫传》自述道：

年始十五六，学为章句。越明年，赵先生指以韩文，野夫(其自号，详后)遂家得而诵读之。当是时，天下无言古者，野夫复以其幼而莫有与同其好者焉，但朝暮不释于手，日渐自解之。先大夫(指其父)见其酷嗜此书，任其所为，亦不责可不可于时矣。^③

此后数年间，柳开因倾慕韩、柳古文，遂自名“肩愈”，字“绍先”(指绍继其

① 见《上主司李学士(昉)书》，《四部丛刊》本《河东先生集》卷七。以下简称《河东集》。

② 以上均见《柳承翰墓志铭》，《河东集》卷一四。

③ 《河东集》卷二。